

【县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专题】

空间视域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莱西市为例

马光川¹, 林聚任²

(1. 潍坊学院 政法学院, 潍坊 261061; 2.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济南 250100)

摘要:我国县域空间单元在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已受到高度重视。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得到了极大关注。从空间视角通过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青岛莱西市县域案例研究,旨在探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实践与经验。研究发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需把城乡空间整合置于更大的空间尺度和层面才会得到更深入认识和理解;在抽离化和再嵌入两种重要的空间整合机制及“空间冲撞”作用下,莱西市县域城乡空间格局正在发生重构。其城乡空间重构表现出的基本变化趋势是:由空间分隔走向整合,由空间分散化走向集中化,由空间同质化走向差异化。

关键词:县域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空间冲撞;抽离化机制;再嵌入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3)01-0042-08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继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高度,对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做出的新论述和新定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这不仅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为弥补农村发展的短板弱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如2019年首先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在全国设立了11个试验区进行探索、先行先试。此方案明确提出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把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作为关键方面,开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改革与试点,在全国各地探索不同的实践内容和任务,通过示范引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改革措施。

由于受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体制和各地城乡之间差异显著等因素的影响,要改变城乡发展差距的现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全面乡村振兴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如何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上实现突破还需要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因此,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突

收稿日期:2022-1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社会学研究”(20&ZD50);山东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保障体系整合的山东实践及其演进路径研究”(16CSHJ04)

作者简介:马光川,男,潍坊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林聚任,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破口和切入点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一些重要举措,其中专门指出要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把县城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县城作为城乡连接的区域中心,应充分发挥衔接城乡的功能。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加强县城与邻近城市发展的衔接。

当前阶段,我国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既符合城乡发展的现实状况,又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一方面,符合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近几十年来我国大中城市发展迅速,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4%。随着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和城区快速扩张,我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阶段。但是相较而言,农村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弱项。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是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弥补乡村发展的不足。另一方面,对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极为必要。我国目前仍有 5 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县域内的乡村,相当多的人不可能离开农村进入大中城市,而是长期生活在县域之内,需要就近就业或实现就近转移。目前,多数县域内村镇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承载力等方面相对落后,跟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较大,故通过加强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有助于改善农村落后状况,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县城虽是城乡衔接的重要空间节点,但现阶段其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彰显。目前我国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的数量约为 65%,县域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 30%左右。对于地域广泛、农村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农业转移人口选择就近城镇化,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和综合承载力,发挥好县城的城乡衔接功能,带动乡村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道路,这是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选择。

二、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力量

(一) 县域作为重要空间载体的定位和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乡发展政策的不断调整,县域城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县域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单元,更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主要空间单元。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域是实施和最终实现的主战场。县城成为农村人口落户定居的重要空间选择,“城乡双栖”“工农兼业”“城乡通勤”成为县域城镇化的新模式^[1]。因此,县域城镇化将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是不同于大都市发展模式的一个新增长极。我国县域城镇化具有巨大潜力,是未来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重要突破口^[2]。

中国县域城乡发展问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费孝通倡导的小城镇研究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大量农村人口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并向小城镇集中转移,小城镇得到快速发展。因此,费孝通当时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把小城镇看作是连接城与乡的纽带或城乡网络的一环,可解决发展农村经济和人口出路问题。这种农业人口转移的模式即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即部分劳动力与土地脱离了关系,转向非农产业,而户口、家庭等仍在乡村”^{[3]25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分散化布局的小城镇发展暴露出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大量农民工开始向大中城市流动,小城镇的吸引力和功能逐渐弱化。与此同时,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也日益体现出来,不仅造成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而且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相脱节,使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城乡分化与差距不断扩大。进入 21 世纪,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大改变。人们关注的问题不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同时对以往的城镇化

道路也开始进行反思,深入分析城镇化质量不高、“伪城市化”、“半城市化”等问题^[4],如城镇化过程中忽视了我国独特国情下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及未能从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状况出发,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创造就业环境和生存条件^[5]。

因此,近年来我国对城镇化发展政策做出了新调整,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总结了我国城镇化成就,同时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民化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空间分布不合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还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更加重视以城带乡,重视提升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进一步强调,城镇的公共服务要向乡村覆盖,城镇的基础设施要向乡村延伸。可见,随着我国对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重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推进全面乡村振兴中正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县(市)域作为联系城乡的关键中间支点,作为覆盖广大乡村地域的区域型行政单元,对缩小城乡二元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7}

(二) 空间的生产和城乡空间结构特性

随着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空间转向”,社会空间分析视角为我们研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为剖析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实践提供了新视角。“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还是一个空间重组和整合过程。从社会空间观点来看,城乡发展不平等可以说是城乡空间结构与要素作用的结果。”^[7]用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来说,空间生产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性的,每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都生产出一个空间——自身独特的空间,“假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空间,所以从一种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方式就必然要求有一种新的空间产生”^{[8]71}。换言之,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其独特的空间实践。反过来说,通过特定空间的研究,分析其属性、结构、功能,我们也可以再现空间产生的社会机制与结构。

本文运用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观,以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的莱西市为案例,剖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实践和经验。他非常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及其再生产过程,“空间是由社会关系所充斥的;它不但由社会关系所支撑,而且由社会关系所生产与被生产”^{[9]286}。他所说的空间生产的逻辑,就是社会空间怎样形成与变化的逻辑。在他那里,空间获得了实践和历史的意涵与规定性,是社会关系生产的后果与再生产之所,其观点以辩证的方式突破了地理、位置等及其附着物的一般思维,提升了其理论的解释力和灵活性。

亨利·列斐伏尔以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性空间为概念工具建构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社会空间理论框架。空间实践意指日常现实在感知空间内的紧密联系,偏重于社会空间的主体实践本身。文中主要指涉行动者历史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本身及其空间意义。空间表征是被概念化的空间,是规划师、技术专家等把感知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等同起来的空间。与城乡空间表征相对应的有城乡规划、城乡布局等。表征性空间则是象征性地使用它的对象物的空间,是已经摆脱了对空间实践和空间表征的感知与认知直接经历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比如已经有品牌效益的小镇、广场,成为其中的部分或对它的接近都会有“与有荣焉”活生生的体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亨利·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的生产”,指涉了对社会空间在三个维度上的建构与更新。

从社会空间观点来看,城乡空间构成了一个关系体。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城与乡之间存在着空间结构上的分化和矛盾。长期以来城市优先的发展趋势使城市具有显著的空间优势,导致各类空间发展资源向城市聚集,而农村空间发展处于明显的空间劣势地位。这种空间分化与矛盾就集中表现在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层面。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空间视角去深入探讨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特性和过程,解释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空间力量。从空间分析的尺度而言,县域空间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到 21 世纪早期,尺度问题已成为城市理论与研究中主流趋势的一个主导性概念和方法论参照点,遍及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10]7}这种分析视角强调关注不同尺度的社会空间过程。由此来看,城与乡不再是静态的区域分布或聚落,而是可以看作一定尺度范围的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空间实践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此视角分析城乡空间关系及其重构与融合^[11]。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空间实践

(一) 莱西作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验空间

莱西市是 2019 年首批入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济青片区中青岛市的县级市之一,它与另外一个入选的县级市平度市同处于青岛辖区的最北部。1983 年 10 月 1 日,原烟台地区所属莱西县与原潍坊地区所属平度县并入青岛市。从地理位置看,莱西市东临烟台莱阳市,西以小沽河为界与平度市相邻,南沿五沽河同即墨区交错接壤。自莱西市到青岛市中心和烟台市中心的直线距离分别是 115.9 公里和 108 公里。随着《青岛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2015 年)、《青岛市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规划技术导则(试行)》(2018 年)、《山东济青局部片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创建方案》(2020 年)、《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21—2035 年)》(2021 年)等相关文件的出台和发展政策的不断推进,莱西市在青岛市和山东半岛都市圈的区位重要性不断凸显。莱西市自入选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以来,为落实重点试验任务,在全国率先启动试验区建设,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涉及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搭建城中村改造合作平台、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等九个方面,并提出了先行先试、善作善成的试验区建设理念,努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莱西样板”。通过近几年的试验区建设,莱西市在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二) 空间冲撞:县域空间格局重构

莱西自古以农为主,但基础十分薄弱^{[12]43}。莱西市南北长、东西窄,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地貌分布类型可分为低山、丘陵、平原和洼地 4 种。地形总趋势是北高南低,北部为低山丘陵,中部为缓岗平原,南部为碟形洼地。农因地而生,北部丘陵地带多为棕壤,肥力偏低,但表土疏松,通透性好,宜花生、地瓜、林果种植,为粮油林牧区;中部平原大、小沽河及濰河两侧地带属河流冲积平原,土层厚质地好,为粮食精种高产区,有农工商一体化传统,为粮菜果渔区;南部洼地属黑土,质地粘重,为粮麻林牧区。传统时代,民因业而居,城因业而兴,中部冲积平原农工商发达地带是人口密集区,也是莱西市中心城区所在地,以此为中心次第展开的是广袤的田野、农舍以及星星点缀的村镇。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空间单元,但县域城乡结构优化与整合涉及各种空间要素关系的调整和重组。关于莱西市城乡空间结构变化的分析,需要放在青岛市域及山东半岛都市圈层内加以定位。莱西市城乡空间的结构布局呈现出南部产城融合、中部城乡融合和北部农业农村综合发展的三个明显圈层。主要受青岛市城乡发展战略布局、空间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影响,青岛中心城市对莱西市城乡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凸显,大中城市扩展对乡村的外溢效应日益得到体现。而莱西市城与乡空间关系的新变化直接表现为城乡空间的重组。

其一,莱西市被纳入青岛市乃至胶东半岛城乡发展的大框架,空间定位得到优化和提升。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体系中,莱西市处于青岛市城镇体系布局青烟城镇发展轴上,是烟威青综合

发展带的关键枢纽,还是山东半岛都市圈、胶东经济圈的一个交通中心和物流中心。2017年莱西市制定了“1+5+4”的发展战略,发展定位是莱西市因地制宜发展与青岛市发展规划进行全面耦合:“1”是指把莱西市建成大青岛北部绿色崛起的典范之城;“5”是指五个具体建设目标,现代化区域性次中心城市、青岛先进制造业基地、半岛交通物流中心、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4”是指生态优先、创新驱动、人才支撑和融合发展的四大保障机制。

其二,县域内部通过产业和功能空间布局的调整,城乡空间得到重构。莱西市近年来实施了“南部提升、中部优化、北部振兴”的空间发展战略,来自北而南的传统粮油林牧区、粮莱果渔区、粮麻林牧区空间格局,正在被自南而北新兴的南部新城的产城融合区、中部中心城区的城乡融合区、北部片区的田园综合体所取代。南部片区毗连青岛市即墨区,地理位置上比莱西市区更靠近青岛中心城区,交通便利,空间区位优势明显。这里正在崛起为金融小镇、绿色小镇和智造之城。其中,作为山东省重点示范镇创建试点及青岛市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姜山镇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生态环境吸引了一批高端创新金融资源,正成为金融资本聚集的“蓄水池”和“动力核”。中部片区着力打造成以县城中心城区辐射带动的城乡融合区,注重推进新村融合、激活村庄发展新动能,搭建村、企、市直单位共商共建平台。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叠加,形成了多元化的空间重构元素。北部片区主打综合发展策略,着力推动土地整体流转,打造田园综合体,以促进乡村旅游、村级社区建制优化等为实践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南部片区正在发展成活力新城。昔日的姜山大洼——低效的粮麻林牧区,开始让位于现代化的产城融合小镇。姜山产业组团和姜山产城融合发展,在青岛市产业整体布局和城乡融合中体现出了重要的示范意义。笔者注意到,中国城镇化开始逐步呈加速度增长,“城市蔓延”呈蛙跳式迅速扩张态势^{[13]57}。姜山这个空间节点,就是青岛市产业发展、产城融合、城乡融合蛙跳出的关键一跳,它盘活了莱西市城乡空间的整体格局。依照中心城市辐射能力递减规律,距离中心城区越近受到的辐射越强,距离越远受到的辐射越弱。从空间区位上看,姜山镇、夏格庄镇、店埠镇组成的南部片区距离青岛中心城市最近,是受中心城市辐射最明显的圈层。南部片区依托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绿色建筑、航空产业等产业基础优势,规划并初步打造成为产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新城。涵盖姜山产业新城、夏格庄绿色建筑产业新城、店埠航空产业新城的南部片区成为莱西城乡发展的新起点。

因此,莱西市在新的城乡融合发展实验政策的引导下,城乡空间布局得到优化,城乡空间要素实现了激活与新聚合,城镇走向集中化,城乡空间结构得到重组,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得以呈现。这些新变化表明,莱西市内外部的城乡空间结构已发生重要转变,已超越了原来相对封闭的县域城乡空间界限,正在融入更大、更开放的空间结构。在空间要素被激活并实现流动和集中化的变革中,新城乡空间结构得以重构。此变化既有地方性空间的特征,又表现出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特征。传统地方性的空间发展因素需要跟各种新的发展因素相结合,通过重组和整合才能实现新发展,这个过程可以称为“空间冲撞”,莱西市的城乡空间重构即体现了这一现象。或者说,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东西在每一个地方性空间层面乃至更高的空间层面上不断冲撞与作用,从而带来了新变化。“相互协调、相互包含、择优综合的关系,使之在发展中取长补短,克服弊端,优势互补……进行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走出一条既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又适合国情的属于自己的道路。”^[14]

(三) 关键支撑:县城是城乡空间融合的重要节点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县域城镇化越来越重要。县城不但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更是县域范围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空间单元。莱西市中心城区正逐步被打造为县域的新空间中心,并把“姜山-夏格庄-店埠”片区打造为城市发展副中心,从而构成“双核引领”的空间格局。莱西市城区位于中部冲积平原,有较好的农工商一体化发展基

础。城区交通便利,有铁路干线和发达的陆路交通交汇。正在形成的三个新圈层结构中,莱西市政府驻地所在的中间圈层是城乡融合的高地,具有辐射带动作用。2020 年 2 月,莱西市对主城区加快推进旧城改造,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和条件,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形象。到 2020 年底,莱西市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 45.46%,不及全国和山东省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64%、63%),更是远远低于青岛市的平均水平(76.34%)。2021 年 6 月,莱西市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放开外来人口落户城镇限制,消除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二元体制障碍,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保障。同时,莱西市加强县域内教育资源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与管理,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城市的功能和综合承载力。

县城作为城乡发展空间融合的重要节点应发挥关键性作用。之前莱西市在地域空间分布上远离大都市,城市化水平偏低,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具有“边缘(城)空间”的一些特征,因此城市功能和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民生保障存在不足,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也较大。而近年来莱西市对城乡发展格局做出了重大调整,把自身定位为“胶东半岛次中心城市”,并力争融入半岛都市圈,同时注重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扩展发展空间,借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机遇,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着力创造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莱西经验。

四、抽离化与再嵌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整合机制

(一) 抽离化:地方性因素

重构中的城乡空间格局是一个双向的进程与后果。它既不是乡村也不是都市单方面生产的,而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借用安东尼·吉登斯的概念来说,是抽离化与再嵌入两种作用机制相辅相成的产物。他把抽离化看作现代性推动力要素之一,即“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15]19}。我们这里可以把抽离化视为一种地方性因素与更大发展空间作用的一种机制。

如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与整合可用抽离化机制加以分析。马连庄镇位于莱西市北部,是典型的农业镇。该镇辖 7 个新村,有 77 个自然村,人均耕地 2 亩多,但因地处山地丘陵地带,地块碎片化严重、规模小、效益低、产业升级困难。近年来,该镇坚持农村土地权益“三权分置”,设立了“镇农业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经营主体”四方联动机制,有效破解了当地农村集体土地价格低、纠纷多、调节难度大的流转市场困境,取得了较好的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镇农业公司(青岛马连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马连庄镇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也是土地流转破局的关键。镇农业公司为国有资产有限公司,莱西市国有资产投资服务中心和马连庄镇财政所各占 60% 和 40% 的股份。四方联动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村集体在土地流转中的旁观者角色,归位于集体土地产权所有者和村民利益的代理人,由此改变了村民个体在土地流转合同谈判中的弱势地位。通过土地流转新模式,该镇已经建成规模化园区 20 个。土地流转与种植模式的变化让越来越多的传统农业从业者从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中解脱出来,进入新的产业领域。

再如“顺联达”合作新模式就是拓展农业农村从业者链条的典型范例。青岛顺联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预处理、储运、销售和拍卖农产品的平台,主要围绕小甜瓜交易市场搭建预处理中心。该公司地处莱西市马连庄镇甜瓜产业园,总投资 1.1 亿元,其中广东丰瑞有资科技有限公司和青岛马连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各占股份的 30%。“顺联达”依托当地甜瓜产业种植优势和产业集中优势,打造华北预处理中心第一品牌。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被吸纳进农产品预处理环节,成为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链条的重要一环。从业者参与的产业链条愈长,获得的收益就可能愈多。还有不少青年人成为网络主播,他们通过有形无形的网络推销本地产品,线上线下的互

动交流超越了地方性空间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抽离化地参与了更多空间的重构,地方性因素与更大的空间要素实现了联结与融合。因此,传统的城乡空间要素实现了新整合,新的差异化空间正在形成,逐步改变了原来乡村相对单一、同质化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如大卫·哈维所强调的,“空间整合的充分条件是由资本和劳动力在地理空间上的机动性所给定的”^{[16]579}。

(二)再嵌入:空间融合

我们用再嵌入泛指从地方性中抽离出去的力量又回归地方性,或外在于地方性的力量进入地方性的机制。尤其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流动空间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非地方性空间力量正侵入无处不在的领域。曼纽尔·卡斯特特别强调“全球城市”和流动空间的意义^{[17]469}。在他看来,先进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的发展可以让先进的服务业快速散布于全球,金融、保险、地产、法律服务、广告、设计、信息搜集以及信息系统管理,包括研发与科学创新,都可以分布于不同的空间领域。而在城乡新空间形成过程中,网络社会要素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空间流动,可带来从地方空间孕育的局部中心模式,向流动空间塑造的多中心网络化、差异化的模式转变。流动的现代性因素更加速了城乡空间冲撞的深度、广度和频度,从而使地方性要素跟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要素相互交织,在更大、更广泛的空间系统内相联系、相冲突,也在持续互动中实现整合,超越了原有的空间限制。

如前所述,嵌入与抽离化机制是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土地流转之后的农业从业者进入田园综合体,或者进入“顺联达”合作新模式成为农产品预处理、储运中的一个环节,从而进入城市甚至更广泛的国际空间,同那里的其他空间因素相交叠、碰撞,甚或建构新的稳固空间,这是抽离化的作用机制。反过来说,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国家政策、外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不断进入,渗透到地方性空间,发生叠加、冲撞、整合,进而生产出新的空间或空间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行政力量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再嵌入,具有典型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在农村产业发展出现困境、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状况下,国家政策和治理因素强有力的回嵌就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关于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城乡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汇成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国家力量持续的强有力引导。实践证明,莱西市被确定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点以来,其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已有显著进展。

五、结语

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县域作为主要空间单元具有重要地位。从空间视角来看,城乡关系可表现为空间结构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空间关系调整与重构的过程,通过要素博弈突破空间分隔,缩小差异和不平等。其重要机制是激活城乡空间生产要素,加强城乡各种要素相互作用,不断改变和重组空间关系结构。这个过程既涉及城乡之间空间利益的冲撞,也涉及城乡发展道路和政策的选择。在这种作用机制下,县域城乡空间的重构出现了如下基本变化趋势:由空间分隔走向整合,由空间分散化走向集中化,由空间同质化走向差异化。

莱西市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案例实践与经验表明,随着我国近年来对新型城镇化和县域城镇化的重视,其城乡空间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或重构。通过重点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县域城镇化综合承载力,推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莱西市已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和自身经验。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虽然地方性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实践经验不能完全反映普遍性问题,但也呈现出一些跟我国城乡发展和社会转型趋势的共同之处。因此,我们在关注县域案例经验的同时,也要关注城乡社会整体性的基本发展趋势。如李培林指出:“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所谓现代

化的社会转型,实际是一个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这种结构改进可能并没有一个宿命式的社会类型终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不断塑造着我们的未来社会。”^[18]

参考文献:

[1] 刘航,张娟.新时期县域城镇化的特征、困境与对策探讨[J]. 小城镇建设, 2021, 39(5): 81-86.

[2] 金三林,张海阳,孙昊,等. 大力推动县域城镇化进程 助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43(10): 53-59.

[3] 费孝通. 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0.

[4]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 21(5): 107-122.

[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我国城镇化体制机制问题及若干政策建议[J].新华文摘,2008(4):23-28.

[6] 李晓江,郭仁忠,王建国. 中国县(市)域城镇化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7] 林聚任,刘佳. 空间不平等与城乡融合发展:一个空间社会学分析框架[J]. 江海学刊, 2021(2): 120-128.

[8]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9] Lefebvre H.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M]//Freiberg J W.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Irvington,1979.

[10] Brenner N. New Urban Spaces: Urban Theory and the Scale Ques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1] 林聚任. 新城乡空间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72-81.

[12] 莱西市史志编纂委员会. 莱西简志[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2.

[13] 马光川. 福利一元与城乡融合[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14] 景天魁. 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J]. 社会学研究, 1999, 14(6): 54-66.

[15]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6]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M].张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2017.

[17]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8] 李培林. 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2): 4-21.

(责任编辑:李凌)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County Level in Spatial Perspective——A Case Study of Laixi County in the National Pilot Zone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A Guangchuan, LIN Juren

Abstract: The county as a spatial unit in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realiz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ount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has been paid great atten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rther emphasizing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unty a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en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im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Laixi in the national pilot zon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Qingdao City.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unty as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put urban-rural spatial integration in a larger spatial scale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wo important spati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mangle of space, the urban-rural spatial pattern of Laixi county is undergoing reconstruction. The basic trend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s follows: from spatial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from spatial decentralization to centralization; from spatial homogeneity to differentiation.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t County Level;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Mangle of Space; Disembedding Mechanism; Reembedding Mechanism